

“伊斯兰觉醒运动”和“穆斯林兄弟会”在政坛上的重新崛起呢？

第四,本·拉丹领导的“基地”组织赢得了喘息机会。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大中东为中心,因此,美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。目前这两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,本·拉丹等主要头目还在潜逃。此次中东、北非剧变可以说减轻了“基地”的内外压力,使它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。目前也门是美国中东反恐的主要合作伙伴,按照美国总统国土安全

和反恐助理约翰·布伦南在2010年12月的说法,“基地”组织在也门的威胁要远大于巴基斯坦。也门总统萨利赫多年来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出了大力,然而目前也门民众几乎天天举行抗议示威,要求萨利赫下台。即便萨利赫最终能够化险为夷,他的反恐努力也必将大打折扣。可以预计,中东、北非剧变增加了美国在中东反恐的难度,“基地”组织将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重振旗鼓,努力发展和壮大队伍,以期再次袭击美国在中东和全球的目标。○

中东北非动荡凸显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内在矛盾

牛新春 (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、研究员)

中东、北非变局发生后,美国的应对再次引起全球关注,其对中东政策中的两面性、矛盾性、多重标准引起热议。在埃及事件中,美国表态首鼠两端,前后不一。对巴林、沙特等国家,美国政策又充满矛盾,既支持王室统治,又支持民众抗议。在对待整个中东、北非的政治变局中,美国则是明显的多重标准,对突尼斯、埃及政府垮台袖手旁观,对巴林、约旦、沙特等国施以援手,对利比亚、伊朗则穷追猛打。

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多重的、矛盾的,而且存在着一对不可克服的矛盾。国家安全、经济利益和价值观,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目标。在具体对外政策中,这三大目标往往有先后顺序,不可能并驾齐驱,但是三者没有一个会长期缺席。在中东地区,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就是确保以色列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,经济利益就是保证石油稳定供应,价值观利益就是推广民主、自由。二战结束后,出于对抗苏联的目的,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越来越多,最终以以色列的安全成为美国沉重的安全负担。同时,人权、自由是美国核心价值观,是美国之所以是“美国”的根源之一。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只不过有时价值观与美国战略利益一致,有时是冲突的。在可预见的将来,美国不可能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,只不过在特定时期,某一个目标的排位更靠前罢了。因此,在中东战略

目标上,美国是一手拿国家安全,另一手拿美国价值观,两手互相冲突。

美国中东政策的执行手段是矛盾、冲突的,起着互相消减作用。为了维护以色列安全,或者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稳定,美国在中东挑选了一些温和穆斯林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。埃及和沙特长期以来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两根支柱,获得了美国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优惠。在美国指导下,这些国家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,镇压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,制裁伊朗、“哈马斯”等反美力量。与此同时,美国却向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施加压力,要求他们推行民主政治改革。在布什“大中东民主计划”的强大压力下,穆巴拉克开放了党禁,允许多党参选,为其最终垮台埋下了种子。尽管埃及的多党选举形式大于内容,但是政治开放的口子一旦打开,就很难再关上。对此,埃及、沙特等国的执政者不满意,痛恨美国干涉内政、削弱其执政基础;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不满意,指责美国虚伪,嘴上说支持民主运动,实质是支持镇压民主运动的政府。因此,在中东政策上,美国是一手支持其盟国,另一手支持盟国的反政府民主运动。

美国对中东事务的态度和立场是矛盾的,也是一个难解的悖论。一方面美国试图脱身中东,不愿意深度介入中东事务,以便把更多的资源用到其他地方。布什、奥巴马两届政府都在试图摆脱对中东

石油的依赖,让美国从中东的政治纷争中解脱出来。在历次关于清洁能源的讲话中,美国领导人都指出,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,才能让美国远离中东事务,增加其战略活动空间。另一方面,美国又要担当全球领导者,不希望在全球重要地区、重大事件中缺席。特别是,中东、北非地区在地理上接近欧洲,这一地区动荡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稳定和繁荣。出于对欧洲盟国的责任,美国也不能撒手不管。在是否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问题上,美国的态度就是这种悖论的反映。从本国利益角度讲,美国非常不愿意对利比亚动武,不想再次卷入中东地区的战争,不想使美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。但是,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,作为欧洲的盟国,美国又不能无所作为。正是在这种两难选择背景下,英法等欧洲国家积极鼓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,而美国则态度模糊,一再强调设立禁飞区的前提条件和困难。

在中东、北非反恐问题上,美国面临越反越恐的矛盾和困境。中东、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因为痛恨美国干涉中东事务,所以才将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

标。但是,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,必须加强同埃及、沙特、也门等政府的合作,深度介入中东事务。这样,美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似乎陷入一个逻辑困境。因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长期干预,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攻击美国。因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美,所以美国才不得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。“9·11”后,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,再度深度介入中东事务,结果引发更大的反美浪潮。

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大国,既要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,又要推行美国价值观,这让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矛盾、悖论。而中东又是一个独特的地区,经济上掌握全球石油供应命脉,地理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枢纽,政治上激进的宗教力量和温和的世俗势力并存,社会上现代和传统互相竞争。于是,就产生了现在扑朔迷离的美国中东政策。目前,美国应对中东、北非变局的政策是矛盾的。未来,中东的政治变革还将进一步向前发展,美国的政策仍然是矛盾的、冲突的、多重标准的。○

中东变局、美国应对、中国启示

袁 鹏 (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、研究员)

埃及缘何变天?美国起何作用?中国有何启示?由于事态仍在演进中,因此难免见仁见智,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。

但就埃及变天的教训而言,至少有三点值得总结:其一,经济上疏离全球化、政治上背离民主化、外交上走向边缘化、社会上拥抱网络化是此次革命最深层原因。百万人突上街头,与其说是对穆氏不满,不如说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绝望。在全球化、民主化浪潮中,曾处同一起跑线上的亚非拉大国,均应对变局、实现崛起,唯埃及反应迟钝,经济上不思变革,政治上落后腐败,外交上无所作为,与世界大潮格格不入。作为曾经的阿拉伯世界领袖,埃在阿以冲突、伊拉克战争、伊核危机等重大问题上“政治失声”,影响力甚至不如半岛电视台,成为可离可弃的“鸡

肋”。相反,在网络化方面则“大门常打开”,“脸谱”、“推特”畅行无阻,各种西方思潮肆意渗透弥漫。这种拒斥全球化、拥抱网络化的错位政策催生经济“僵化”与社会“异化”,令表面平静的埃及终于在沉默中爆发。

其二,政府对“公民社会+微博时代”催生的社会剧变敏锐度不高、重视度不够、应对无方,终致未能挺过最后一关。“公民社会”现象是当今世界大潮。体现在埃及,则是“后伊斯兰主义一代”的崛起与军队的异化。此次埃及革命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“青年人革命”或“军队起义”,引人深思。长期以来,无论西方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,在看待中东青年一代时,更多关注其反美、反西方的宗教极端化一面,却忽视其反独裁、要民主的一面。事实上,近 30